

评估学生体验

卡米尔·坎迪科·豪森

卡米尔·坎迪科·豪森 (Camille Kandiko Howson):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副教授

电子邮件: c.howson@imperial.ac.uk

学生调查是循证高等教育运动的一部分。基于大学生学习体验的学生反馈起源于西方民主改善的驱动力, 各学科的期末评估是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部分。这促进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对话, 尽管对话只会导致下一批学生 (而不是对话学生) 的进步。这种做法很快就融入了质量保证的内外部流程。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评价起源

20 世纪 90 年代, 科研人员开始开展有关教学的调查, 减少对基于研究的绩效指标的关注, 而通常国内资助计划和大学全球排名都将绩效指标纳入考量。在许多拥有全国标准化调查的国家, 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 绩效指标还充当政府的透明度工具, 并能够使整个教育行业进行基准化分析测试。

最近, 在学生作为消费者的市场中, 学生调查成为了关键数据来源。学生调查刺激了机构之间的竞争, 并在营销和公关活动中发挥作用。ratemyprofessors.com 等学生调查网站的运营虽然不受机构控制, 但是可能会影响教师的试用期考核和晋升前景。

学生调查何处生?

20 世纪 80 年代由保罗·拉姆斯登 (Paul Ramsden) 开发出澳大利亚课程体验问卷 (Australian 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简称 CEQ)。该问卷是最早出现的大规模学生

调查之一。该问卷在消费者 (学生) 满意度方面提供了明确的依据, 考察的方面涵盖教学、目标和标准、工作量、评估和独立性等。

20 世纪 90 年代, 美国科研人员为了回应以研究和声誉为基础的排名以及相关的质量讨论, 开展了关于学生参与度的调查。这些调查侧重于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做了什么, 以及机构如何创造支持学生成就 (student success) 的发展环境。“全国学生参与度调查”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建成 NSSE) 旨在为机构提供可操作的数据, 重点关注学术挑战、合作、师生互动和校园环境等方面。

21 世纪初, 英国采取了更倾向消费主义的方法, 于 2005 年启动了全国学生调查 (National Student Survey, 建成 NSS), 旨在为将要进入大学的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课程时提供有用信息。该调查很快被广泛应用, 成为公共问责工具, 以及提升机构质量的工具。有点讽刺的是, 上述调查最初遭到许多学生会的抵制。

学生调查何处去?

正如所料的是, 每一项大规模的学生调查都有助于其他学生调查的发展。英国的学生调查为 CEQ 奠定基础, 这也对 NSSE 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全国标准化调查则与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更广泛的个性化、以制度为基础的调查形成对比。

参与度调查侧重于制度改进、学生自我塑造以及社会人力资本和公民参与度的发展。参与度调查已在全球广泛采用，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爱尔兰、新西兰和南非，日本、韩国和墨西哥也采取了类似的调查。参与度调查之所以产生深远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参与度调查并未广泛应用于排名。

全球化也影响了学生调查的传播。CEQ 问世后，澳大利亚采用了一段时间的参与度调查，随后在 2015 年，澳大利亚转为采取当前的学生体验调查。相比 CEQ，这种调查更加市场化。英国的 NSS 则定期接受审查（保罗·拉姆斯登主导进行了前三次审查）。NSS 多次受审的原因是调查过于官僚化，调查结果与物有所值的政府优先事项和就业结果相悖。

由于开展精确调查开支巨大、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和政府优先事项迥然不同，所以关于该议题的比较研究很少。研究从而更侧重于国内、机构间、跨学科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比较。学生调查作为质量保证、认证和监管系统的一部分，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在一些国家，学生调查有助于建立绩效制度，实现课堂有效讨论。有趣的是，在英国，学生调查的权重在“国家教学卓越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中被降级，而是优先考虑就业成果。

挑战和替代方案

获取学生数据获利良多。国际排名努力将教学方法涵盖在排名中，以减少排名侧重研究和声誉的批评。但事实上，教学方法很难进行国别比较，因此上述努力很难实现。《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进行合作，共同制定高等教育大学排名打开美

国市场。但是上述排名需要学生完成调查，以收集充足数据进行院校排名，因此面临着重重挑战。同样，经合组织“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OECD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简称 AHELO）项目成果也未能达成国际共识（参见洛克 [Loukkol] 和比特保尔 [Peterbauer] 在《国际高等教育》第 104 期中的文章）。

正如学生调查的范围十分广泛一样，对学生调查的批评也是如此，批评的范围包括调查的可靠性、措施的精确性和响应率。学生调查将许多学生的意见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声音”，这是在同质化学生，形成的学生观点也是简化的、工具性的。此外，还有大量研究是有学生评分与反馈中性别偏见和其他特征偏见的问题，此类数据用于教师试用和晋升时，问题层出不穷。

学生调查面临的挑战也促使人们常常呼吁需要别的替代方法来收集高等教育质量的数据。这些替代方法包括更多质性的、本地化的措施，采取以学生为合作伙伴等其他合作性的替代方法。学生反馈从学生对教师的形成性反馈转变为学生对自身大学生活体验的总结性评价，可能会造成学生意见决定大学有效教学的危险。

从更宏观的层面，有必要对研究进行更大程度的三角测量，以解决如对学生评分与成绩通胀之间关系的担忧。一直以来，人们长期呼吁更多使用学习分析，但学习分析在机构内部仍未标准化。更好的做法是，各国都能使用统一的学习分析。由于新冠疫情大学被迫转向使用网课，这一变化凸显了现有的学生数据之多，并展现了现有数据如何与学生学习交互。但这一做法的风险是学生的行动可能会掩盖其心中真实的想法。